

文本与技术:清代花谱的生成与传播

刘爽 惠富平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清代花谱目前所见应为146部,较之明代花谱在菊花、兰花、月季三种专谱数量上大为增加。《广群芳谱》与《花镜》开拓了花谱创作的两种路径:一是朝廷官方提供的“厚民资生”的宏观价值导向;二是民间士人形成的“大而经济,微而理学”的价值旨趣。花谱文本受到了政治关涉、学术演进、个人兴趣的立体塑造,呈现出旨趣各异的文本形态。花谱技术实际上形成于士人园圃的地方性微观知识,花谱对园艺技术的实录往往滞后于技术的产生;花谱技术受制于悦目怡情、名花情结的审美标准,存在重文轻图的局限,现代学者在“科学想象”的语境下,对花谱文本进行增删改造,从侧面印证了花谱技术的缺憾;花谱置身于士士相因、士农相隔、士商相间的阶层交际网络中,其技术的交流、更新与传播终归无法突破阶层界限,亦难于走向近代转型。

【关键词】清代;花谱;文本;技术;传播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5-0023-11

Text and Technology: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Flower Books in the Qing Dynasty

LIU Shuang HUI Fu-p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e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There are about 146 flower books in the Qing Dynasty. Compared with the Ming Dynasty, the number of chrysanthemum, orchid and rose book has increased greatly. *Guangqunfangpu* (《广群芳谱》) and *Huajing* (《花镜》) created two ways of writing flower book: one is the value orientation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second is the value purport formed by the folk intellectuals. The text of flower book has been shaped by political involvement, academic evolution and personal interest, presenting different text forms of purposed interests. Flower technology is the local micro-knowledge formed in the scholar's garden. The record of flower book to horticultural technology often lags behind. Due to the aesthetic standards and the complex of famous flowers, the technology has the limitation of emphasizing the text rather than the picture. In the context of "scientific imagination", modern scholars add, delete and transform the text of flower, which prov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echnology of flower books. In the social network between scholars, peasants and businessmen, flower books can not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the stratum in terms of technical exchange, renewal and dissemination, and it is difficult to move toward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Qing Dynasty; flower books; text; technology; spread

春兰秋菊、荷香梅韵,清人对于花卉怀有不可动摇的妙赏之心。在此背景下,清代的花卉文献蔚为

[收稿日期] 2021-03-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农业史研究”(17FZS049)

[作者简介] 刘爽(1991-),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史;
惠富平(1963-),男,博士,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史。

大观。目前学界对于清代花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献、技术与文化层面的考量,以搜罗版本、访求存佚为方式的文献学取向,止于对花谱文本的静态描述^①;以古为今用的技术史取向,则以现代科学眼光来提炼花谱中的技术因子^②;基于花谱文本来探究花卉的历史源流与文化内涵,业已形成独特的花文化研究系列^③。然而,文本的内涵却远不止于此。一方面,向外扩展对物质介质、社会指令等的考察;另一方面,向内深入到文献体制与书写策略的研究,通过书写的人际关系探讨士人的社会网络,甚至考察文本创作、传播、阅读、展示,从而可以将文本分析引入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范畴^④。如若从花谱文本出发,则会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葛小寒从明代花谱切入,呈现出花谱文本撰写中“主观交往”与“客观知识”的二重面向,而技术性文本往往又陷于士人的社会网络之中,从而限制了纯粹自然著作的诞生^⑤。本文所论清代花谱较明代更加繁盛,其文本生成更趋复杂,如何理解花谱文本生成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以及花谱中的技术属性如何被士人传统、社会文化裹挟。花谱的传播、阅读与发展如何?这是本文所需要探讨的问题。

一、清代花谱述略

花谱之名首见于宋人张岫所作《花谱》,该书如此描述花谱:“以花有千叶多叶、黄红紫白之别,类以为谱。”^⑥可见在古人认知中,花谱是按照花的类别来编排记录花卉的历史源流、栽种之方、品种品鉴等义项的书籍,所谓“一时花谱为传芳”。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題》中创立了“谱录”类目,从此花谱在目录学中的归属为“谱录类”书籍。当代学者在整理花谱时,则将其列入“园艺”或“花卉”类,以“通谱”与“专谱”,即所谓综合性花谱和专业性花谱来区分之。

(一)综合性花谱

王达在统计明清农书时所列“园艺”类对综合性花卉文献极尽搜求,约有40种^⑦,但所录杂驳,偶有错漏,兹从中将不适于本文所论的花谱析出。李皋《花隐篇》和《圃花小说》实为明末作品,“篇”为“簾”之误,当做“花隐簾”;《赏花幽趣录》作者孙知伯实为明代人士;俞樾《十二月花神议》以咏花诗词串连月份;段永源《梅兰竹百咏》实为所画梅兰竹菊所配诗歌百咏;宋萃《黄海山花图咏》为花木体裁的诗歌作品;张潮《花鸟春秋》篇幅短小,以花鸟词赋描述月份,类似明末小品文;王士禛《花草蒙拾》为词话性质的文学作品;焦循《花部农谈》为戏曲论著;张桐《盆树小品》和苏灵《盆玩偶录》所记内容注重盆与景的审美构造。以上诸书大都为望文生义而误收,皆与花卉栽植无涉,难以入花谱之列。此外,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为卷帙较大的农书,况且基本不涉及花卉种植,故不列入花谱。闵宗殿在方志中发现陈鼎《百花志》和《百草志》、李志清《花卉图考》、陈怀玉《花语》^⑧,但诸书皆为存目,故本文实际所录清代综合性花谱为36部,其中存世22部,佚失14部。

(二)菊花谱

据王子凡统计清代菊谱总数为35部,存世27部^⑨。其中爱菊山人《菊谱》《清在堂菊谱》《丁莲峰先生

① 付壹强:《故宫藏民间刻本〈秘传花镜〉考述》,《农业考古》2019年第6期。

② 倪根金、周米亚:《传统菊谱中的艺菊技术探析》,《农业考古》2014年第1期。

③ 相关研究参见姜楠南:《中国海棠花文化研究》,南京林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苑庆磊:《中国芍药文化研究》,北京林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林玉华:《中国水仙花文化研究》,福建农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④ 黄卓越:《“书写”之维:美国当代汉学的泛文论趋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⑤ 葛小寒:《交往与知识:明代花谱撰写中的两个面向》,《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⑥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7页。

⑦ 王达:《中国明清时期农书总目(续)》,《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

⑧ 闵宗殿:《明清农书待访录》,《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第4期。下文闵宗殿所录花谱,如无特殊说明,皆录自此。

⑨ 王子凡、张明珠、戴思兰:《中国古代菊花谱录存世现状及其主要内容的考证》,《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

菊谱》三部为画谱,故本文不录。据潘法连考证,安徽省博物馆藏有题作清代汪畹腴《培植兰菊法》的写本,该书由“兰花”“菊”两部分构成,兰花部分记录作者植兰经验,菊部分则以月令形式记载艺菊技术,二者书写体例与文字风格迥异,很可能是两部书辑录在一起^①。根据互著与别裁原则,今将其分别归入兰花谱与菊花谱。《中国农业古籍目录》载有叶天培《艺菊秘要》,其书与《叶梅夫菊谱》同书异名;《老谱新菊》为《九华新谱》附录,实为同一文献;新增《树菊丛录》有四川图书馆抄本^②。闵宗殿在方志中发现《云根菊谱》《菊经》《菊谱》《艺菊志》4种存目,故本文所录清代菊花谱为38部,存世26部,佚失12部。

(三)兰花谱

据周肇基、魏露苓统计的中国古代兰谱中清代部分有27部,存17部,佚10部^③。佚失兰谱中《兰蕙原说》《兰蕙栽培法》有抄本传世,现藏于南京图书馆,《中国农学遗产文献综录》在统计园艺类农书时将咏兰诗歌《兰语集》收入^④,王达收录的《燕兰小谱》实为一部以兰花喻演员的戏剧著作^⑤,故不录。今依据沈渊如、沈荫椿的《兰花》新增8种兰花谱:周怡庭《名种册》;孙侍洲《心兰集》;周荷亭《种兰法》;杨子明《艺兰说》;刘孟詹《艺兰记》;黄氏《兰蕙图谱》;枫泾程氏《兰蕙论略》;鲍薇省《艺兰杂记》^⑥。以上诸书大都不传。闵宗殿在方志中发现刘楠《兰谱》和丁雄飞《兰书》存目,加上汪畹腴《培植兰菊法》的兰花部分,故本文所录清代兰花谱扩增至37部,其中存19部,佚18部。

(四)月季花谱

何红英统计清代月季花谱有13部,存12部,佚1部:评花馆主《月季花谱》、陈葆善《月季花谱》、郁汝镛《月季花谱》、鹅湖松下花农《月季花栽培法》(疑与许光照《月季花谱》同书异名)、许光照《月季新谱续》、汪宗淦《月季谱》、费松年《甬郡月季花谱》、鹅湖松下花农即张之万《月季新花谱》、刘传绰《月季花谱》、沈庚良《月季花谱》、张之万《月季花谱》、姚叔廉《月季花谱》;佚名《月季花谱》失传^⑦。

(五)牡丹花谱

李娜娜统计的清代牡丹谱为8部,存6部,佚2部^⑧。王达所录蒋廷锡《牡丹百咏》为画谱诗作,与花事无涉;郭如仪《种牡丹谱》存目。闵宗殿从方志里找到了4部牡丹谱存目:沈嗣骏《牡丹续谱》、释仲休《越中牡丹花品》、李芳《续牡丹谱》、余鹏年《牡丹谱》,其中余鹏年所著与《曹南牡丹谱》同书异名。故本文所录清代牡丹花谱为11部,存部,佚5部。

(六)梅花谱

王达所录梅卧云《种梅心法》为道家炼丹著作,《种梅诗抄》为文学作品,二书皆与梅花种植无关;唯有清末余痴生《燕梅花候记》记录的是结合物候期记载梅花的引种驯化知识。笔者所见1部:朱亢宗,道光丁酉贡生,在仙居“手植梅花成林,终日嘯咏”,所著有《梅花谱》3卷^⑨。故清代梅花谱仅2部,存1部,佚1部。

(七)琼花谱

王达所录《琼花志》扬州朱显祖编次,开篇琼花图三朵,两朵正面,一朵侧面。讲述自宋代以来琼花的地理变迁,与琼花相关的典故、名物等,书中没有涉及琼花种植的内容。故清代琼花谱仅见2部存世:俞樾《琼英小录》和潘宗鼎《续琼花集》。

① 潘法连:《安徽历代农学书录选辑(续完)——〈中国农学书录〉拾遗》,《中国农史》1985年第3期。

② 张芳、王思明:《中国农业古籍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99页。

③ 周肇基、魏露苓:《中国古代兰谱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④ 犁播:《中国农学遗产文献综录》,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231页。

⑤ 王达:《中国明清时期农书总目(续)》,《中国农史》2001年第4期。下文王达所录花谱,如无特殊说明,皆录自此。

⑥ 沈渊如、沈荫椿:《兰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3页。

⑦ 何红英:《中国传统月季花谱综合研究》,华南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9-17页。

⑧ 李娜娜、白新祥、戴思兰、王子凡:《中国古代牡丹谱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

⑨ 光绪《仙居志》卷15《人物志下》,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八)其他

凤仙花谱有王达所录2部:赵学敏《凤仙谱》和钱泳《凤仙花谱》皆存;荷花谱1部:杨钟宝《缸荷谱》存;茶花谱2部:朴静子《茶花谱》存,李祖望《茶花谱》佚。鸡冠花谱见闵宗殿所录2部:丁敬《鸡冠花谱》和张雍敬《鸡冠花谱》皆佚。

表1 清代花谱分类表

类别	综合谱	菊花谱	兰花谱	月季谱	牡丹谱	梅花谱	琼花谱	凤仙谱	茶花谱	鸡冠谱	缸荷谱
数量	36(22)	38(26)	37(19)	13(12)	12(6)	2(1)	2(1)	2(1)	2(1)	2(0)	1(1)
占比	22.9%	26.4%	25.7%	9%	8.3%	1.4%	1.4%	1.4%	1.4%	1.4%	0.7%

说明:括号内为存世花谱数。

综上所述,清代花谱目前所见总数应为146部,其中存世92部。比之于明代花谱,在菊花、兰花、月季三种专谱数量上大为增加,菊花谱增加21种,兰花谱增加29种,月季谱增加11种^①。本文所录花谱虽然难以涵盖清代花谱的全部,但大体能够呈现出该时期花谱的总体面貌。

二、文本塑造:花谱生成的机制

“活的”文献研究是以实证的方式重建写作过程的“事件链条”,其中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影响制约着文献的生成、再生产、传播与阅读^②。由此而论,花谱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其文本的生成受到文化环境、意识形态、权力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塑造。

(一)他者塑造

清代花谱承接明代余绪,大致沿着两条路径前进。第一种是朝廷钦定的官方路径。康熙四十七年(1708),汪灏等馆阁词臣奉敕编纂了《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该谱以明代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为蓝本进行增删,卷帙浩繁,计100卷。它对花谱的撰写提供了宏观的价值导向:一、将对花卉植物的考察重新拉回到了农业史的视野之内;二、提出了“思究百昌生殖之理”的明理之说;三、表达了敬天佑民的治国愿景;四、总结了“上原六经,旁据子史”,兼收裨官野乘之言、才士歌吟、农夫传述的编纂方法^③。具体而言,御定本对于《群芳谱》的改造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花谱体量的扩容。《群芳谱》原本花谱内容1卷,记载46种花,每种寥寥百余字或数百字,内容包括花名、花候、品种、形态以及栽种之法。御定本将花谱部分扩增至32卷,记载112种花。但是在内容上只是极尽搜求之能事,“翻内府之藏书,广群芳之旧谱”,海内外所见花谱资料一一采录,以广后人见闻,将花名考证、花史源流、花事掌故大加发挥,对于栽植之法却未能有所突破。

其次,对花谱体例的修正。康熙御题序言:“冠以天时,尊岁令也;次谷次桑麻,崇民事也;次蔬茶果木花卉,资厚生溥利用也;终以药物,重民命也。”^④以此为指导思想,词臣们将《群芳谱》原本散入各种作物之前的“天时岁令”集中编纂为《天时谱》,依据《本草纲目》扩充《药谱》的数量,并以此作为终章殿后。

最后,对花谱知识的“提纯”。《凡例》认为《群芳谱》原本“义类可取,尚多疏漏,删其支冗,补其阙遗”,对所引书籍中的错讹进行修正,将桃、李、梅、杏等皆分载于《果谱》,实现花果分载,并将葛、木棉附入《桑麻谱》,删除《鹤鱼谱》。相较于《群芳谱》而言,这种做法欲保持花谱知识的纯粹性,但实际上长期困囿书

① 明代花谱数量可参见葛小寒:《交往与知识:明代花谱撰写中的两个面向》,《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② 冯国栋:《“活”的文献:古典文献学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③ 刘竞飞:《从〈花史左编〉到〈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论明清花艺类著作中的两种宏观话语》,《长江论丛》2018年第10期。

④ [清]汪灏等:《广群芳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页。

斋的馆阁之士只是追求花卉知识名义上的“纯粹”,在具体知识上盲目追求体量,并未加以审查。

相较于“御定本”,后世花谱创作受《群芳谱》的影响颇深。王廷鼎的《花信平章》其实是对《群芳谱》中“花信”部分的发挥:“夫所谓信者,原借卉植之芳菲,预验韶华之消息。惟此裁红刻翠,聊佐花史,笔削之权,未为僭也。江湖逋客,屡操芳谱,笔削之权,花若有灵,知我罪我,所不计焉。”^①查彬的《采芳随笔》仿照《全芳备祖》《群芳谱》体例,记录题咏花果蔬木诗句,亦述性状,考其源流^②。可见《群芳谱》在花谱知识的叙述上依旧起着示范与启示作用,而《广群芳谱》因为卷帙浩繁,一般士人所得不易,故而其影响仅止于一种宏观上的价值导向作用。由二书目录可见,《广群芳谱》对《群芳谱》的改造仅限于体量、体例、类目的表层修正,并未触及到思想与技术的内核(见表2)。

表2 《群芳谱》与《广群芳谱》目录对照表

《群》	谷谱	蔬谱	果谱	茶谱	竹谱	桑麻葛	棉谱	药谱	木谱	花谱	卉谱	鹤鱼谱
《广》	天时谱	谷谱	桑麻谱	蔬谱	茶谱	花谱	果谱	木谱	竹谱	卉谱	药谱	—

第二种是士人隐者的民间路径。其中以陈淏子的《花镜》为代表,该书刊刻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其《自序》云:“余生无所好,惟嗜书与花。年来虚度二万八千日,大半沉酣于断简残编,半驰情于园林花鸟。世多笑余花癖兼号书痴。……堪笑世人鹿鹿,非混迹市廛,即荣情圭组,昧艺植之理。虽对名花,徒供一朝赏玩,转眼即成槁木耳。何不发翁枕秘,授我《花镜》一书,以公海内,俾人人尽得种植之方,咸颂翁为花仙可乎?”陈氏自号西湖花隐翁,《自序》可见其作为隐士的花鸟之情与山水之性。《花镜》目录分为:花历新裁;课花十八法;花木类考;藤蔓类考;花草类考;附禽兽鳞虫考。在花谱撰写的类目上以“岁时”开端,专以花木为对象,对于园艺栽植方法却有了质的突破,不仅详尽实用,还配以“花镜图”,图文并茂,直观明了。陈氏对于植物的生长之理,“无不顺其性情,而朝夕体验之。即有一二目之未见、法未尽善者,多询之嗜花友。以花为事者,或卖花傭,以花为活者,多方传其秘诀,取其新论。复于昔贤花史花谱中,参酌考证而后录之。”^③《花镜》独树一帜的写作风貌源于其知识主要不依靠考证,而是首先基于自身的耳闻目验与亲身实践,典籍记载只是辅助手段。陈淏子好友丁澍认为前代花谱“未及禽鱼为欠事”,《群芳谱》略于种植之方,而只有《花镜》“先花木,次及飞走,一切艺植、驯饲之法,俱载是编”,并将《花镜》奉为“池馆之设,园林之课”的指导书籍。张国泰对《花谱》评价甚高:“大而经济,微而理学,借禽鱼以娱情,仿佛麟游羽化。更念栽培之法,古人有书而未备,豢畜之术,时流从事而弗嘉。”^④由此可知,《花镜》专以花木为事,融进了自身的观察实践,增加了花谱的技术内涵,寄托了浓厚的花草品鉴之情,对后世花谱影响深远。

(二)自我塑造

清代花谱作者群体组成主要为士人阶层,撰写动机十分复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变化,政治变迁、经济发展、学术演进都是影响士人主观创作的潜在因素。

明遗民撰写的花谱受务实学风的影响而具备实学品性,同时又散发着隐遁避世的苦节意味。如上文所述《花镜》所蕴含“大而经济,微而理学”的价值旨趣,正是拜陈淏子的明遗民风貌所赐。曹溶(1613—1685)所作《倦圃蒔植记》,一方面不再重艺文、轻技术,而是以叙述栽培方法为主,整篇文章除却名实源流的简单交代,其余都是朴实实用的经验之谈;另一方面,四库馆臣对其评价曰:“未脱明季小品积习,此书乃其晚年游戏之笔。”^⑤曹溶乃崇祯进士,入清以后,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摇摆不定,他“长于经济”而又

① [清]王廷鼎:《花信平章》,安晓东主编:《中国历代农林文献集成》第68册,学苑出版社,2018年,第94、107页。

② 林枫林:《查彬及其〈采芳随笔〉》,《广东图书馆学刊》1986年第4期。

③ [清]陈淏子:《花镜》,安晓东主编:《中国历代农林文献集成》第67册,学苑出版社,2018年,第14页。

④ [清]陈淏子撰,伊钦恒校注:《花镜》,农业出版社,1962年,第6页。

⑤ [清]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16,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608页。

难于发挥。晚年自号“倦圃”，本想以躬耕园亩来践行苦节之志，在经历了明亡阵痛之后，抛却了隐居田园的逸趣，取而代之的是注重经济的实学取向。可资说明的还有巢鸣盛(1611—1680)的《老圃良言》，该书只是纯粹的栽培方法，丝毫不涉及田园之趣。巢氏履迹不入城市，与吴中徐俟斋、宣城沈寿并称为“海内三遗民”，与长洲徐枋、桐乡张履祥、海盐陈恂等交往友善，彼此以气节相勉。他隐居巢家弄37年，以耕织自给。此外，徐石麒入清后殉节，曾作《花佣月令》；明清之际归庄作《寻花日记》，自谓“乱离时逐繁华事，贫贱人看富贵花”。由此而言，明遗民群体矢志园艺花草皆源自于他们的耕读情结，在园圃实践中演绎耕读传统，思考所谓“学稼之辨”，将之作为践行道统的绝佳方式^①，最终在学风与心态的转变之下，所撰写的花谱呈现出以实用种植技术为主，同时背后又蕴藏着立志行道的矛盾面貌。

乾嘉时期花谱撰写整体上存在着政治关涉与学术表征的二重维度。明清之际的实学风气使得考据学手段也影响到花谱的撰写，如孙之騄的《枝语》以花木为对象，引经据典，偏向考证，与花卉种植并无多大关联。经学家毛奇龄认为该书“不立名目，不分类别，似赋、似颂、似蒙经寓言、似小品，有神农之经、岐伯之志、刘邠之谱、曾端伯诸公之集录，所未备者”^②，以《枝语》为代表的花谱，纯粹以考证为事，以花木之名，从事名物、音韵、小学等学问，成为一种“数典之书”^③。又如乾嘉学人朱显祖的《琼花志》独对琼花一事煞费苦心，其内容构成有琼花图1页，考证内容3页，其他篇幅则辑录宋元明清诗、诗余、赋若干，目的只是为了“亦可备好古者之一助”^④。台湾学者王汎森认为清代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也大量反映在自然科学上，造成清代文献的“自我压抑”现象^⑤。而花谱文本的生成过程或能成为这种现象的注解。

时至晚清，内忧外患逐步加深，士人的闲情雅致有所消减，传统花谱的创作亦随之式微，总体上不复之前繁荣。臧谷自号竹西菊隐翁，著有《问秋馆菊录》与《霜圃识余》，刊刻于光绪十四年(1888)，自谓家世三代从事东篱，作“菊录”是为了厘清宋代以来“菊谱”之名实混杂、以伪传伪的局面，该书以菊花品鉴为主，记载81个品种，皆为作者亲见，分6个品级(绝品、逸品、上品、中品、次品、又次品)，外加杂品；在菊花栽植方面直接承袭叶天培的《菊谱》，将其中“养菊法”29则附于书后^⑥。此外还有邵承熙的《东篱纂要》作于光绪十五年(1889)，他种菊自遣，关于栽培方法的见解多与程岱庵相合^⑦；陈葆善的《艺菊琐言》作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自谓种菊“出于天性”，文字朴素，所记栽培法更加细致^⑧。以上所存菊花谱依旧属于自明代以来形成的“品种+种植”撰写模式的花谱^⑨。虽然如此，《农学丛书》刊行的慕陶居士(吴廷康疑为该书作者)《艺菊法》与传统花谱有所分异，书分啮土、留种、分秧、上盆、修葺、护养、幻异、种别等八目，文字简要，语意通俗，似乎着意去除了菊花品种与品鉴方面的内容^⑩。与此相对，《八千卷楼书目》所收日本山崎敬义《樱之辨》、松冈成章《樱品》、英国韦廉臣和艾约瑟《植物学》等书^⑪，则呈现了花卉世界的另一番风貌，但此时传统花谱受西学的影响尚微乎其微。

① 韩品玉、刘爽：《明遗民的农耕情结及其影响流变》，《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② [清]孙之騄：《枝语》，安晓东主编：《中国历代农林文献集成》第68册，学苑出版社，2018年，第130页。

③ 四库馆臣评价《海棠谱》为“盖数典之书也”，可谓一语中的。参见[清]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16，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613页。

④ [清]朱显祖：《琼花志》，安晓东主编：《中国历代农林文献集成》第66册，学苑出版社，2018年，第507页。

⑤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5页。

⑥ [清]臧谷：《问秋馆菊录》《霜圃识余》，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

⑦ [清]邵承熙：《东篱纂要》，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

⑧ [清]陈葆善：《艺菊琐言》，光绪二十八年(1902)刻本。

⑨ 葛小寒以“品种+种植”撰写模式来形容明代花谱，不同于宋代的“品种+品鉴”的撰写模式。参见葛小寒：《交往与知识：明代花谱撰写中的两个面向》，《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⑩ [清]慕陶居士：《艺菊法》，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

⑪ [清]丁立中：《八千卷楼书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551页。

三、技术幻象:花谱传播的困境

现代学者对花谱研究的“科学想象”可以从侧面印证花谱技术的缺憾。农史学者利用现代植物学理论来阐释观照传统菊艺中的菊花繁殖、施肥、露地栽培、病虫害防治、盆栽、整枝等技术内容^①。伊钦恒对《花镜》进行了改造,对《群芳谱》重新诠释。他对花谱部分的卫花、雅称、花姑、奇偶、花异、餐花、花毒等所谓“迂腐迷信”成分悉加剔除,将所述花木重新分为草本花和木本花,并对原书中的花以现代植物学眼光进行重新诠释^②。伊钦恒校注《花镜》时,将花木类、藤蔓类、花草类中的果树抽出单列一卷,将其中的“占验”“占候”的“迷信部分”加以去除,试图保持花谱的“科学性”^③。王子凡从现代园艺学角度进行菊花谱研究,统计古代菊花品种达1776个,但在菊花命名、育种等技术层面,不得不与菊花审美、观赏、食用价值相结合^④。学者们对花谱中的技术缺陷进行改造,采用比附现代科学、剔除与现代科学无关部分的方式,达到花谱的科学展示,却使得传统花谱技术体系与现代科学的扞格展露无遗。诚如白馥兰(Francesca Bray)所言,“技术是个‘险象环生的概念’,一个用现代主义的推测和纲领装备起来的布满陷阱的词语。”^⑤关于花谱技术形成与传播的历史情境究竟如何,本文将从以下几点剖析。

(一)技术选择与表达的局限

首先,花谱在士人心中的总体定位是矛盾的。一方面,花谱在传统学术中属于细枝末节,不足为外人道也。早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就将花草归置为农家之末:“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华,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⑥在古人心中,农家者流已是“小人之事”,花卉尚未成资生之业,尤不足取。乾隆间文人吴升在《九华新谱》中作《自嘲诗》:“痴莫痴,治生百事都不知,僦居隙地不盈尺。翻泥掘沟成两畦,种菜肥可茹,种瓜甘如饴,不蔬不果艺此百种菊。”^⑦另一方面,花谱撰写者视之为“枕中秘传”。花谱在古典知识中一般被归为“谱录类”,加之御制《广群芳谱》确立了其宏观价值系统,故而士人对花谱创作也有拔高的一面。丁澍认为《花镜》“种种驯饲之方,可与陶朱公《养鱼》,浮丘《相鹤经》并传”,张国泰更认为“虽数末枝,不减琅函,是编一出,习家之池馆益奇,金谷之亭园备矣”^⑧。更重要的是,士人作花谱并不以生产为目的,只为在园艺小道中寻求身心的解脱,所谓“乐花忘劳,此其效也”。

其次,士人的名花情结与审美标准决定着花谱所载种类不可能尽善尽美,有时候还会走向偏狭。古人的花卉审美以梅花、牡丹为重,《全芳备祖》《群芳谱》《花镜》都将梅花列于首位,牡丹为花王、梅花为花魁。此外,菊花、兰花也占据重要地位。许兆熊《东篱中正》对菊花、兰花评价甚高:“赵宋以来,郁然清玩,拳厥陈根,独冠园圃,史正志之辈肇为谱序,乃与牡丹芍药等宠矣。于是黄白红紫,其色惟四,大小精粗,其目复数十,而好之弥深,艺之弥勤,天地之秀,舒荣吐英,亦愈出愈奇”^⑨,菊花为“花之隐逸者”,兰花为“花中君子”,月季、荷花、琼花、凤仙花、鸡冠花皆有专谱著录。题名居易主人的《名花谱》只是将《群芳

① 倪根金、周米亚:《传统菊谱中的艺菊技术探析》,《农业考古》2014年第1期。

② [清]王象晋纂辑,伊钦恒诠释:《〈群芳谱〉诠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224页。

③ [清]陈淏子辑,伊钦恒校注:《花镜》,农业出版社,1979年,第11页。

④ 王子凡:《中国古代菊花谱录的园艺学研究》,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页。

⑤ [英]白馥兰著:《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吴秀杰、白岚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⑥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页。

⑦ [清]吴升:《九华新谱》,安晓东主编:《中国历代农林文献集成》第86册,学苑出版社,2018年,第36页。

⑧ [清]陈淏子著,伊钦恒校注:《花镜》,第5页。

⑨ [清]许兆熊:《东篱中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2页。

谱》中几种“名花”摘录,这种节录方式对花谱创新并无裨益。在品鉴名花种类时,对花的颜色、形态、习性、数量、命名都提出了具体细致的要求与标准,而士人之间的审美取向参差不齐,故而在各种标准的选择下,花谱记载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评花馆主在《月季花谱》中对月季品种的取舍就呈现出“上品尤贵”的选择性倾向,随记37种上品,在上品中又筛选出蓝田碧玉、金瓯泛绿、朝霞散绮、虢国淡妆、赤龙含珠、晓风残月、淡抹鹅黄、春水绿波、六朝金粉、玉液芙蓉等10种“贵品”,其余各品种“种数甚繁,不及悉载”^①。那些少数入选的“良种”未必有着多么高的生物学价值,那些不被载入的品种或许是优胜劣汰的结果,但它们终归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

最后,自《花镜》以后,花谱中普遍存在重文轻图的现象。《花镜》的插图幅数各版本不甚一致,最多的花说堂版本有322幅,最少的善成堂版本有144幅,伊钦恒认为其中的木刻图像未能表现植物特征,对书中插图亦大加改造,采用现代插图,参照《中国植物图鉴》等书原图进行注解。许簪和《兰蕙同心录》附图58幅,吴传沅《艺兰要诀》亦有附图。但古人做图难于达到客观写实,除了绘画技法局限外,还在于其审美倾向,古代花木题材的画谱就是追求一种写意境界,花谱配图的标准在于作者主观意图的传达。白馥兰在论及中国古代《耕织图》时说:“视觉主题与图像已为16世纪末中国社会阶层所熟谙,有些出于教化的目的,这些版本却没有画出楼璠以来的技术任何改进与提升。”^②王加华也认为御制《耕织图》多半发挥的是教化之功,很难发挥技术推广的作用^③。花谱配图自《花镜》以后也越来越少了,几至于无,这种重文轻图现象也阻碍了花谱技术的表达与传播。

(二)技术实录的因袭与滞后

按照王子凡的分类,清代花谱类型以栽培技术为主,以菊谱分类为例:品种谱7种、栽培技术谱16种、品类诗谱1种、画谱2种、综合谱5种^④。清代花谱中的栽植方法实际上是滞后于技术产生的一种“实录”。如巢鸣盛“村居荒僻,只邻并一二老圃相与往还,尝为余言种植之事,大要有十,依法试之,罔有不效,嘉蔬美果,实叨其回,因述为《老圃良言》,以告世之从事灌园者”,所记十法为“下种、分插、接换、移植、修补、保护、催养、却虫、贮土、浇灌”皆来自老农所述^⑤,可见巢氏对老农所言种植之法是先实践再记录,是对民间技术的滞后记录。又如朴静子《茶花谱》中“浇灌培植法、剪枝、摘蕊、接花法、变色变态说”等技术来自于“园叟”,所谓“花盛则变色变态,揆其理,不特根株老嫩之别”^⑥,但作者在总结茶花颜色与形态变化的原因时,认为是根株的年龄所造成的,这或许是原因之一,而根据文本记载可见,茶花“变色变态”更多是由于“浇灌培植法”带来的养分供应和土壤酸碱度的变化导致。可见,士人实录的技术经过加工,反而会出现偏差与讹误,难以反映技术的原貌。再如吴仪一《徐园秋花谱》对香蓼栽植场景的描述:“香蓼宿根重生,与诸蓼冬枯春复下子者不同,植之盆盎,高仅尺余,本可径寸,柔枝荡漾。花菲垂垂,有红黄二色,俱带淡白,恹困之状,如黯澹慵妆,不胜罗绮,春初以蓼实入蒲庐,盛水浸湿,悬煖处遂生红芽。”^⑦这种对栽植实践的单纯记录,是难以上升到一种理性认识的。

花谱之间相互因袭使得技术陈陈相因,如四库馆臣对《名花谱》的批评:“其书集抄《群芳谱》之类而成,冗集无绪,字句凡鄙,引用谬误,不过粗识文义之人偶然抄录成册耳。”^⑧庄继光《翼谱丛谈》收入冯具区《栽

① [清]评花馆主:《月季花谱》,《续修四库全书》第11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19页。

② [英]白馥兰著:《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吴秀杰、白岚玲译,第5页。

③ 王加华:《技术传播的“幻象”:中国古代〈耕织图〉功能再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2期。

④ 王子凡、张明姝、戴思兰:《中国古代菊花谱录存世现状及其主要内容的考证》,《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

⑤ [清]巢鸣盛:《老圃良言》,中华书局,1985年,第1-3页。

⑥ [清]朴静子:《茶花谱》,《续修四库全书》第11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03页。

⑦ [清]吴仪一:《徐园秋花谱》,安晓东:《中国历代农林文献集成》第68册,学苑出版社,2018年,第103页。

⑧ [清]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16,第608页。

兰法》、陶歌庵《养兰说》、李九巖《养兰诀》、袁石公《兰言》、周樾林《兰讯》,虽然保存了部分亡佚的兰谱^①,但内容基本是前代花谱的辑录。袁世俊《兰言述略》更是如此:“历观嘉庆时吾乡克柔朱公《第一香笔记》,道光问怡亭周君《名种册》,咸丰初沪渎孙公侍洲《心兰集》,及同治间余姚周君荷亭《栽法》,其立意大同小异,悉宗唐宋说部体例,采集诸书而折衷之,然似有破觚为圆,断雕为朴之意,以致尚风华者,未免讥其鄙略也,予择而录之,并参以一己之见闻,以期其洞澈无蔽,而华实能并茂也。”^②在大同小异的江浙兰花谱中,采集诸书折衷摘录是撰写此类花谱的主要方式。

在此过程中,前人所提供的框架与体例无形中制约了花谱的创新。如顾禄在撰写《艺菊须知》时,认为前人花谱不如作者友人梅花庵主(李瑞清)、洞虚子的精详,多数内容却仍以明代屠承榘《渡花居东篱集》为蓝本,两位友人的意见和自己的心得仅仅成为了点缀;臧谷撰写《问秋馆菊录》时,在栽种方法上直接将叶天培的养菊法29则附于书后,自己则无所发明;邵承熙《东篱纂要》自谓研究栽培方法的见解多与程岱庵《西吴菊略》相合,这也难以说成是一种巧合。实际上,编撰者本来也想有意增加栽种之法的实用技术,但是因为知识局限而无能为力,这就导致后期花谱往往是园艺劳作经验与花卉知识同质化体量的增加,难于有质的突破。

(三)士人网络下的技术传播

清代士人的交际网络是显性与隐性并存的。明遗民多隐遁避世,他们所著花谱虽然多以栽植方法为主,但此类花谱传播极少。就目前传世的花谱来看,其流传历程坎坷,花谱一般篇幅短小,几百字到千余字不等,难有单行本,多被编入丛书。徐石麒的《花月令》,以月份为经,记叙园艺操作方法,但流传很少,嘉庆年间焦循刊录过一次并为之作序,光绪十年方才刻入《传砚斋丛书》;巢鸣盛《老圃良言》被曹溶编入《学海类编》方传^③。传世花谱大多以丛书文集形式存在,单行本传世的除了几部大型花谱,其余都被藏于私人或者图书馆,其中存在大量未曾刊刻过的手抄本。赵孟俭《桑篱园牡丹谱》已失传,仅剩原谱的序和跋,为菏泽牡丹乡花农赵孝成家藏手抄本;鹿文仲的《东篱品汇》只有北京图书馆抄本,未曾刊刻^④。可见,清初花谱在此背景下大都流传不广。

康熙之后,花谱撰写益渐兴盛,相关文本的传播也渐趋广泛。在士人统摄花谱的背景下,其中所呈现的交际网络如何影响花植技艺的传播?当文献中的“交际”与“象征”的功能使得“私”的文本转化为“公”的文本时,不同人群对文本的接受与认同有着显著的差异性^⑤。以《花镜》为代表的民间士人所撰花谱大都具备源于田野中的地方性微观知识,其来源主要是城市中士绅、知识分子的权力书写与村落中农民、底层士人的口口相传,他们也是花谱中技术的主要产出者。花谱的生成空间往往集中于士人所从事园艺劳作的庭园苗圃,如曹溶的“倦圃”,高士奇的“北墅”,赵孟俭的“桑篱园”等,或在山中、或在城郊,与当地的花农花市共同形成了小区域内的行业特色。但是士人花谱与花农花市的技术又有着极大区别,乾隆文人沈清瑞的《山塘种花人赋》描述了山塘种花人对移种、扦插、剔蕊、灌溉、剪枝等园艺技术:“移根受露,剔蕊梳烟,编篱护竹,压涧分泉,蒔红满圃,种碧成田。披凉雾而晨栽,拨晴纱而午插,培云阁雪之劳,接萼删条之法,汲桃涨以顷瓶,荷蕙风而动锄。”^⑥就某种程度而言,花农高超的种植技术与“园丁之巧”是士人花谱所难以企及的。

士人以花谱为媒介寻求同好,往往视之为“不传之秘”。归庄《寻花日记》中梅、杏、樱桃、山茶、玉兰、桃、李、看牡丹记、寻菊记等内容,皆源于作者与骚客酒人、道流名僧的周游经历。其中所载菊花64种采

① [清]庄继光撰,郭树伟注:《翼谱丛谈》,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

② [清]袁世俊著,莫磊、王忠注译:《兰言述略》,《中国兰花古籍注译丛书》,中国林业出版社,2019年,第4页。

③ 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198页。

④ 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第210页。

⑤ 冯国栋:《“活”的文献:古典文献学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

⑥ 参见沈婧:《历史时期苏州地区花卉业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40页。

自北门陆氏,80种源于汪氏。陆、汪两家之花,共有金红松子、银红松子、洞宾袍、秋牡丹等47种;汪氏独有紫松子、麦粟等32种,陆氏独有大红球、黄木香等27种^①。吴升《老圃新菊》搜集的菊花新种有46种,其来源分别为:春草堂戊寅新菊沈润亭(吴氏称其“平湖沈丈”,因其寓斋相距稍远,没能亲眼所见,只知道四种白色菊花)、拜经楼戊寅新菊张庚拜、怡园戊寅新菊马实夫、二泉书屋戊寅新菊严渔恬、太平村农新菊沈少云。从中可见种菊者的住所、姓名、身份、以及菊花年份、菊花种数等信息,吴氏种菊交往的对象有师长、友人、农夫。这种交往是双向互动的,吴升曾依据旧谱试验菊花新培育法,分赠数株于马实夫;王彤轩也向马实夫询问怡园菊事,乞南来佳品,投赠寄送严渔恬南来各种^②。虽然他们在新育品种上互通有无,交流频繁,却鲜见背后技术方面的记录。叶天培《菊谱》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趣,其自序云:“审气候、别雨暘、调燥湿、体性情、相时之宜、因地之利,殆未可为外人道者。荒斋无事,抒轴余怀,聊书数则,公诸好事,未知世之同嗜者,且以为何如也。得心应手之妙神为契而口弗能言。惟方子养菘得余三昧,程子廷罇、张生体元、余子抱洁、王子岂几、洪子德明、任子香云、宋子笠薪、江子石思、亦颇称同嗜,相视莫逆。”^③叶氏觉得相时因地的经验“未可为外人道”,写就的花谱也只是供同道中人传阅。陆廷灿更有言:“艺菊本以娱亲也。”^④在这种亲密且狭窄的交际空间中,技术的交流与传播是极其有限的。

士士相因、士农相隔、士商相间使得技术难以更新。以牡丹谱为例,牡丹的集中产区主要在洛阳、曹州、亳州等地,决定了牡丹谱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地域的趋同造成了牡丹谱存续的同质化。贯盛一方的桑篱园实为赵氏花园,赵氏家族世喜牡丹,其中赵昆岳、赵克勤、赵孟俭皆一脉相承。钮琇虽为江苏人,其撰写《亳州牡丹述》中所记亳州牡丹品种来源于友人刘子石、王子鹤所口述,杨复吉认为“较薛凤翔后来居上”^⑤,该书与《亳州牡丹谱》尚有差距,实为夸大之语。又以兰花谱为例,杜文澜《艺兰四说》中的品类说、种植说、灌溉说、培护说,皆是“爰采众论”,将常州屠氏《兰蕙经》、嘉善陈氏《王者香集》、苏州朱氏《第一香笔记》、余姚黄氏《兰蕙谱》汇辑一处而成^⑥。士人在种花过程中碰到问题往往去寻求友人帮助,而不是老农。袁世俊喜爱兰蕙,但未得栽培之法,先是询问友人周君怡,又寻觅旧谱“批阅揣摩”,稍知蒔植之理,即对兰花品种旁搜博采,终于在友人那里得到“绿水仙”这一品种。袁氏的种兰、学兰经历基本是在他的士人圈子中进行的。他对花贩的肆意采集和花商的逐利流露出厌恶之情,“自来文人学士,以及缙绅大贾,靡弗爱玩,每届春初,贩佣蚁集,藉以谋生。而绝壑深林,掇取殆尽,街南巷北,累百盈千,风雅之途,竟成逐利之藪,殊可欺也”^⑦,虽然士商关系在明末以来有所转变,有时还出现了二者角色的互融^⑧,但在花谱中士商之间的隔阂依旧存在。袁氏《兰言述略》在描述苏州的兰花会、兰花市场的盛况时,认为“山阴周怡亭三千金,寓沪之余姚魏筠谷万金,嘉兴高嘉盛二万金,枫泾陈九畦万金,沪城孙侍洲二千金,苏城至多者不过千金,浒关则不过数百金,至余姚各种户,其值虽巨,皆藉以为财,故不足载也”^⑨,可见他对于以花谋利的行为嗤之以鼻。又如杨钟宝《缸荷谱》道出了商人对于荷花品种的囤积居奇:“有贾于扬归者,出数小瓷盆示客,人竞以银钱市艳,贾又故昂其值,亦时出其值以醉客,顾吝其种,种必残其余。”花商这种“罹人之有我有也”的心态难免会造成荷花部分品种的失传^⑩。

① [清]归庄:《寻花日记》, [清]顾湘辑:《小石山房丛书》, 齐鲁书社, 2018年。

② [清]吴升:《九华新谱》, 安晓东主编:《中国历代农林文献集成》第86册, 学苑出版社, 2018年, 第36-39页。

③ [清]叶天培:《菊谱》, 安晓东主编:《中国历代农林文献集成》第68册, 学苑出版社, 2018年, 第86页。

④ [清]陆廷灿:《艺菊志》, 安晓东主编:《中国历代农林文献集成》第84册, 学苑出版社, 2018年, 第13-15页。

⑤ [清]钮琇:《亳州牡丹述》, 安晓东主编:《中国历代农林文献集成》第68册, 学苑出版社, 2018年, 第55页。

⑥ [清]杜文澜:《艺兰四说》, 安晓东主编:《中国历代农林文献集成》第86册, 学苑出版社, 2018年, 第63页。

⑦ [清]袁世俊著, 莫磊、王忠注译:《中国兰花古籍注译丛书》,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9年, 第14页。

⑧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 第333页。

⑨ [清]袁世俊著, 莫磊、王忠注译:《兰言述略》, 第54页。

⑩ [清]杨钟宝:《缸荷谱》, 《农学丛书》第2集第25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

结 语

中国古代的花植之书,其源流甚为复杂。各书或重历史掌故,或重词翰章句,或重种植技巧,或重文人雅趣,承袭不同,也导致体例各异。德国汉学家薛凤(Dagmar Schäfer)认为,自然著作的接受史揭示了17世纪中国思想界知识生成的复杂性,也照亮了一个独特的知识传承历史中的某些特质^①。明清之际,遗民苦节行道、离群索居、隐遁避世使得士人社交网络不似明代显著,较为实用的种植栽培知识逐步充实花谱内容。《广群芳谱》与《花镜》开拓了花谱创作的两条路径:一是朝廷官方“厚民资生”的宏观价值导向;二是民间士人“大而经济,微而理学”的价值旨趣。《广群芳谱》因其卷帙浩繁而无法普及,一般士人无法获取,体例与内容上对花谱撰写无法达到微观指导效果。相反,《花镜》成为后世花谱文本生成的重要范本,从《花镜》现存近十种清代版本来看,该书在康熙之后刊刻频繁,流传甚广。乾嘉时期,受考据学影响,一部分花谱掺杂了小学、名物等知识而呈现出杂家风貌,例如四库馆臣对《枝语》评价为:“取花木蔬果之类,各为诠释。略于形色性味,而详于名义、或穿凿其偏旁、或附会其音声,偏旁音声皆不可通,则宛转假借牵合故实,以寓议论。是书不伦不类,姑夫杂家。”^②专谱之中出现了陆廷灿《艺菊志》这样的集大成之作,该谱“广收博采,集而成志”,趋向于对古典花卉知识的总结。晚清传统花谱的数量有所下降,西学植物学著作传入,但二者的知识体系难以出现直接的碰撞与交融。总体而言,花谱文本受到了政治关涉、学术演进、个人兴趣的立体塑造,呈现出旨趣各异的文本形态。

与国计民生、世道人心息息相关的花谱流传甚广;小道技艺难登大雅,引为枕畔秘籍的花谱反以为贵,这两种现象成为清代花谱的传播与阅读策略。从谢堃(1784—1844)写作《花木小志》的历程可见:“假它人之手而之四方,凡遇花木,稍有所异,必购而携之,其所不能携者,图而记之,询及它州外县,所有异于是者,乃以所涉江浙闽粤以及燕赵晋楚所见言之,公悦复命,以笔志之。”^③谢氏与友人乔梓交流所见花木,以扩大自己的行迹来采集花卉,旨在扩大花谱涵盖面,实际所见《花木小志》乃是形成于一方园圃的地方性知识。清末陈启谦在《农话》中已指出传统农学的本质:农学分二大派,曰“士夫之农学”,曰“农夫之农学”。士夫之农学详于理,农夫之农学详于法,秦汉以后之农书率士夫之农学耳,匪农夫之农学也^④。就花谱而言,其技术的选择难以脱离悦目怡情、名花情结的审美标准,技术表达存在重文轻图的局限,在士士相因、士农相隔、士商相间的交际网络中,其技术交流、更新与传播鲜能突破阶层界限,亦难于走向近代转型。在辑录旧知与创造新知之间,传统士大夫终归难以担当技术生产与传播的重任。

(责任编辑:徐定懿)

[参 考 文 献]

- [1] [清]陈淏子辑,伊钦恒校注.花镜[M].北京:农业出版社,1979.
- [2] [明]王象晋纂辑,伊钦恒诠释.《群芳谱》诠释[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 [3] 张芳,王思明主编.中国农业古籍目录[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 [4] 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5] [英]白馥兰著.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M].吴秀杰,白岚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 [6] 王达.中国明清时期农书总目(续)[J].中国农史,2001,(3).

① [德]薛凤著:《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吴秀杰、白岚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1页。
 ② [清]孙之騄:《枝语》,安晓东主编:《中国历代农林文献集成》第68册,学苑出版社,2018年,第249页。
 ③ [清]谢堃:《花木小志》,安晓东主编:《中国历代农林文献集成》第68册,学苑出版社,2018年,第3页。
 ④ [清]陈启谦:《农话》,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八年(1902)刻本。